

China and the World:
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y,
State and Civilization

正眼看世界

历史、国家与文明新论

李永晶 著

ZHENGYANKANSHIJE
LISHI GUOJIA WENMING XINLUN

China and the World:
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y,
State and Civilization

正眼看世界

历史、国家与文明新论

李永晶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眼看世界：历史、国家与文明新论 / 李永晶著.
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5
ISBN 978-7-5495-6540-5

I. ①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世界史—文化史—
文集 IV. ①K1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556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网址：http://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7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8.375 字数：150 千字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大
觀

n a t i o n a l i n t e r e s t

《大观》编委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 利 李永晶 李 筠 邱立波 吴征宇 泮伟江
林国华 周林刚 施 展 咎 涛 翟志勇

总 序

周边世界看中国,中国看周边世界,自古如此。

古典时期,中国看周边世界,五服之分,华夷之辨,皆非建立在常识基础上;周边看中国,倒是更实用主义,因需调整视角。这差别,原因无二,盖中国不真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,中国文化是强势文化。

近代以来,东西碰撞,强势的中国文化遭遇更强势的西方文明,前者仍沿袭看周边世界的姿态,一败再败,不明就里,自此陷入混乱,自知与他知失去方向感。

中国人从无认识他人的训练,历史长河中,他人永远是被定义的对象,而非自我认知的坐标,所以,中国人也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。中国是天下的中心,中国人是天下的主宰。天下的根本逻辑,是神州文化四处布化,是各化外之地的归化。这里没有历史,历史早在布化与归化陈陈相因的循环中终结。

中国人也做过认识周边世界的尝试,比如魏源,比如梁启超,比如顾维钧。所有努力,或不被重视,化作国朝上下共识,或被一次次激烈革命打断,半途而废。中国人始终建立不起对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,最终也不能完成自我定位,因此付出的代价,庶几无可计算矣。

然世界离不开中国,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。认识他者,同构于自

我认知过程,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,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。只有在完成此项工作的基础上,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我们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,从而探索我们的利益所在,为世界规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本丛刊试图为此作出努力。

这努力也是一班有志者的自我教育过程。当代知识人长期昧于小圈子利益,坐井观天,画地为牢,长于“主义”之争,短于建设性批判,局限了他们的视野,混乱了他们的立场。而一个民族的命脉,很大程度系于知识人的全部积累、创造性工作。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,进而构建全球格局体系,都缺少不了知识人的精密且具宏观视野的基础工作。此一过程艰难而艰深,在开启学习先进国家理念和方法同时,更重要的,是开展自我教育,以使我们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,在其间获得灵感,取得进步。

导言

关于时代的诊断：新世界主义的视角

这是一部关于我们的时代认识与世界认识的诊断文集。由于当下的中国正以巨大的规模卷入世界事务中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。作为健康诊断，我们有必要找出我们对于自我与他者、对于世界自身的认识的症候所在，并给出相应的病理分析，最后开出适当的处方。这里所说的“诊断”，是指依据我们身边的出版物进行的具体而微的分析，而这种分析最终将涉及个体、国家、历史、文明，换言之，涉及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多重面相。下面我将从我们最近的自我认识出发，简略描画一下我们对这个时代症候的认识。

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以来，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论述层出不穷。从各种评论家、学者到政府官员，再到意识形态专家，人们热衷于谈论——甚至应该说是礼赞——这个最近三十余年全球变化最大的国家。这些论述可概括为 1990 年代前期

出现的“中国崛起论”以及最近数年出现的“中国模式论”。既然是论述,自然包括意见的分歧与对立。尤其是身处这个发展进程中的人们,他们对现实苦乐甘甜感受的巨大差异往往导致他们意见的激烈对立。

另一方面,从局外的角度来看,中国的巨变景象殊异——这个世界正在因为中国的改变而改变。但问题是,中国正在如何认知这个过程?未来的世界将走向何方?这个世界会好吗?对这些大问题的疑虑,绝非杞人忧天。这个如此巨大规模的国家的变动,正在对生活于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幸福发生着影响。于是问题进一步转换为:中国,不,我们自己为此——即对世界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态——做好准备了吗?由此我想起了两部相关的中文译著,即出版于1999年的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以及出版于2003年的弗朗西斯·福山《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》。这两本著作中的观点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左右着中国的世界认识。

但这却是一个不幸的结果。原因不在于二者见识与论述的浅薄——这方面出现了不少的批评之作;原因在于,在中国学界,它们将许多中国学者的思维引向另一种浅薄——他们极力去论证,由于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的优异特质,诸如“协和万邦”“四海一家”“人文化成”“修文来远”“王者不治夷狄”等古典思想,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“文明的和解”,因为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规定,云云。与此相应的主流见解是:“中国只能走、必须走,而且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。”往好的方向说,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克服“美国中心论”,形成世界的多元主义论;往坏的方向说,这些论述正在诱发一种

闭锁的世界认识,我们可称之为“中国中心论”。

上述看法之所以浅薄,原因就在于,在这种主流的认识中,人们对“世界秩序”的理解非常狭隘。世界是什么?秩序又是什么?崛起又是什么?——言者对这些本质重要的概念视而不见,皆心照不宣地将其简化为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概念。比如,“世界”仅仅被视为由“国家”构成的不安稳的集合体,自私自利成为通行其中的原则;与此相应,“秩序”被理解为强权政治下的国家大小、国家实力大小的排列。

这些过于简化与陈旧的看法,至少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,有害无益。中国的发展,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。对这种事件的认知及其历史意义的自觉,要求我们具有同样格局的眼光;这种眼光就是这篇导言所要说的“世界主义”。具体言之,我们必须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的发展进程中,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中,才能获得确切把握这个事件的全部意义。兹事体大,这里略微展开。我们就拿“中国只能走、必须走而且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”这句话说事儿。

这句话的背景我们都清楚,它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两种论调。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,人们对于这个事实的评价出现了二分:“中国威胁论”与“中国崩溃论”。中国官学两界对此进行了自我辩护:中国既不是威胁,也不会崩溃,因为我们还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。如同人们注意到的一样,由于“崛起”这个字眼儿呈现出锐角式的突然上升景象,具有短暂性、突发性以及潜在的破坏力量,容易与“中国威胁论”产生共振,所以,“发展”再次得到了强调,“和平发展论”成为自我认识的主要表述。中国的发展不是对外的强权扩张,

而是全球化的一部分；中国基于“全球大市场的资源的和平获取”来进行自我发展，成为这种论述的最主要证据。

然而，从当下世界、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最新状况来看，“资源的和平获取”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善。这句话之所以被用于自我的正当性辩护，正是因为它包含着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认识——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，历史上的大国均基于对外武力扩张与资源掠夺才获得了发展。这是一种可以得到理解与解释的历史记忆。但问题在于，当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篇时，这种基于回溯历史的正当性辩护——姑且认为这种辩护在知识上已然成立——就显得不合时宜。毕竟，世界社会低水准的道德自律无法为新时代的国家行为立法，更无法参与世界文明发展之大势。事实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尤其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，由于“人权”与“环境”观念的全球化，基于市场的资源的“和平获取”不能自证自身。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，如果忽视甚至无视这些已然全球化的观念，那么这种发展往往就被视为“威胁”。比如，美国与日本最近数十年遭受的批评，以及它们因此而进行的自我调整，背景正是这些普遍观念的日益发展与深入人心。

正是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很遗憾地发现，中国正处于饱受批评的境况；而我们的反应，更多的是基于封闭思维的自我辩护——论者们对于历史、对于文化、对于国情特殊性的强调，正在形成表层逻辑上自洽的自我认识，即我在前面提到的“中国中心论”。在此意义上，中国被视为威胁，获得了可理解的视角。这是因为，在这种视角下，这种威胁不是传统意义上对国际秩序的威胁，不是所谓的“霸权转换”引

发的不安与忧虑,而是指对世界自身发展的非正向影响。就此而论,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论者还是和平发展论者,皆处于问题的表面与外围,因而未能进行有效的自我辩护。这里面首先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是:何谓世界?

如上文所言,认为世界仅仅由国家构成,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认识;世界秩序绝非国家秩序自身。世界由人、事、物构成。与此相应,世界秩序是一种多重秩序,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“物的秩序”与“事的秩序”。在前者上,中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。毕竟,巨大的国内市场与低成本的劳动力为资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;表现在制造业上,就是资源与生产设备的进口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。在这个意义上,世界的改变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必然结果,并不值得过分关注。但在后者的意义上,在事关道理、公平、正义的“事的秩序”上,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改变尚未得到恰当的认知;中国旧有的世界认识,正在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。

毋庸置疑,让许多人疑虑重重的问题,即中国将怎样改变世界,正是发生于“事的秩序”的层面上。就此而言,对中国自身的秩序的探索与认知,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探索与认知,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建设。中国内在于世界自身,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知。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同义反复。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经济的成长,是否能引领人民精神与世界文明的同步成长?这是中国高速增长中最有意义的,或者说唯一有意义的问题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必须让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充盈于我们的认知空间。

这种新世界主义,是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理念,正在为后民族国家

时代的世界提供建构性的原则与力量。最近数十年急速普遍化的全球法治、人权与环境理念的发展,正在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秩序的宿疾与沉疴,也正是这种新世界主义的精神源泉,在这种文明观念的观照下,世界优先于国家,人自身优先于国家,环境优先于发展,竞争优先于管制,自由优先于一切……只有接纳、吸收、融合这些世界文明的最新理念,中国的发展才能获得持续的思想动力,中国发展这一世界性的事件,其世界史的意义才能全部得到展现。

因此,在这个新时代,不是作为民族国家,而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发展,这才是中国这个大国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。对这种事态的分析与建构,也正是新世界主义的理论目标与现实关怀。

本文集所收各论,正是在这样一种新世界主义的观照下,对自我与世界展开重新认识的实践。“天下大势,浩浩汤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”——这些具体而微的分析与论述,正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诊断以及处方。文明发展无止境,认识亦无止境,希望本书所展开的实践多少有益于我们这个时代。

2013年11月19日,于昆山市花桥镇寓所

目 录

导 言

关于时代的诊断：新世界主义的视角	00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世界认识的重建：列强史观批判	00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世界误认的结构要因：案例研究	012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政治领袖的灵魂与人类文明	02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琉球、日本与东亚的权力结构	030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 继续启蒙：现代日本社会的自我意识	03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六 美国在中东的失败	047
------------	-----

七 如何正确认识日本右翼？	05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八 大正民主主义：神话与现实	06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九 日本模式论的历史教训	069
--------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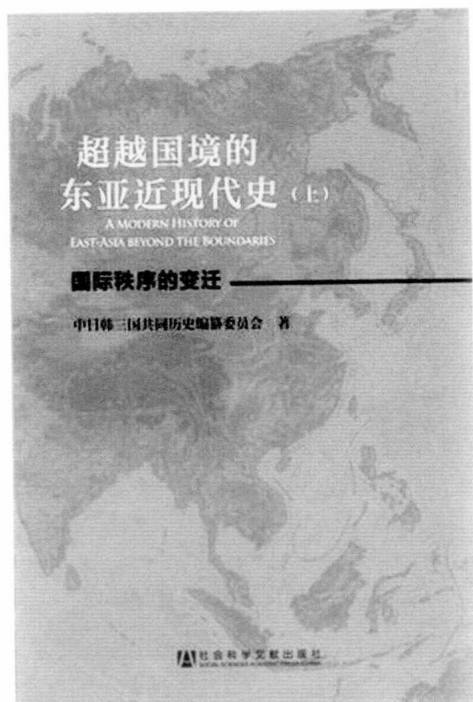
十 政治大国与政治领袖	078
十一 《菊与刀》与世界秩序的建构	087
十二 帝国课业:二战后美国世界政策的展开	102
十三 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政治	112
十四 革命史观的安魂曲	121
十五 国家幻想症与国家恐惧症	129
十六 神人秩序:自由如何得以可能?	137
十七 全球化与劳工运动的终结	146
十八 德国的历史教育与欧洲政策	154
十九 施特劳斯:道济天下之溺	164
二十 市场与传统国家观念的终结	175
二十一 作为政治技法的嘲笑	182
二十二 抗争与和解:政治社会学的视角	187
二十三 帝国、民族国家与现代化	194
二十四 告别国家:市民社会理论的重建	211
二十五 新贸易立国论: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生成	228
后 记:面向世界社会的探索	248

世界认识的重建：列强史观批判

一、对世界的误解

就试图叙述东亚共同史这一主旨而言,眼前这部《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》¹有名副其实之处。这么说,并非因本书著者打着“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”的旗号——读者可能会质疑这个“委员会”的代表性——而是因为,在预设的“西方—东亚”的对比图式中,本书通过建构对“东亚”的整体认知与一体感,获得了某种超越其内部国境的视角。然而,这种相对的“成功”反而将本书致命的缺陷暴露出来:它所呈现的世界认识充其量仅为东亚三国所共有,而未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境。如果东亚三国的世界认识有着同样的问题症候,那么这种“超越”的意义就将极其可疑。造成这种认识论上的

1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:《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3年2月。



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,对作为整体的“东亚”视角的问题性,本书的编纂委员会竟毫无知觉。为“超越”而超越的政治意图遮蔽了方法论上的谨慎探讨。

由于这种严重的缺陷,在本书编者所建构的“超越国境”的历史认知框架当中,现实存在于东亚的诸多问题很难得到解释。比如,在许多人看来,日本政治家近年在事关历史认识的问题上一再挑衅,甚至到了执拗的地步。这对于饱受侵略与杀戮之苦的人们而言,无异于疯狂之举。对日本民选政治家的相关言论及行为的憎恶,导致日本成为另类的存在。本书编者之间就如何叙述同样作为受害者的日